

王克非 编著

# 翻译文化史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克非 编著

# 翻译文化史论

李赋宇题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翻译文化史论

王克非 编著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11.75 印张 4 插页 273 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 2 000 册

ISBN 7 - 81046 - 273 - 3

H·484 定价: 17.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目 录

<b>第一章 总论:翻译文化史及其研究</b> .....	(1)
一、何谓翻译文化史 .....	(1)
二、翻译文化史研究的意义 .....	(3)
三、翻译文化史的特点 .....	(6)
四、翻译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	(8)
五、翻译文化史的研究课题 .....	(10)
<b>第二章 中国古代部分</b> .....	(13)
第一节 绪论 .....	(13)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 .....	(15)
一、佛经翻译界之代表人物 .....	(15)
二、翻译所据原本及译场组织 .....	(17)
第三节 佛经翻译的文体 .....	(20)
第四节 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影响 .....	(27)
一、国语实质之扩大 .....	(27)
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	(29)
第五节 佛经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31)
第六节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思潮 .....	(44)
一、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论的关系 .....	(44)
二、佛经翻译理论对中古文论的贡献 .....	(51)

<b>第三章 中国近代部分</b> .....	<b>(63)</b>
<b>第一节 绪论</b> .....	<b>(63)</b>
<b>第二节 近代翻译文学</b> .....	<b>(67)</b>
一、晚清翻译文学概论 .....	<b>(67)</b>
二、近代翻译文学一例	
——林纾的翻译 .....	<b>(80)</b>
三、严复的翻译	
——以《天演论》为例 .....	<b>(117)</b>
四、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与意义 .....	<b>(133)</b>
<b>第三节 近代翻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b> .....	<b>(157)</b>
一、清末翻译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 .....	<b>(157)</b>
二、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	<b>(162)</b>
<b>第四节 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b> .....	<b>(187)</b>
一、外国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	<b>(187)</b>
二、西方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走向 .....	<b>(207)</b>
<b>第五节 中日近代翻译事业概观与比较</b> .....	<b>(222)</b>
一、萌芽期(1660—1895) .....	<b>(222)</b>
二、第一过渡期(1896—1911) .....	<b>(225)</b>
三、发展前期(1912—1937) .....	<b>(235)</b>
<b>第四章 外国部分</b> .....	<b>(273)</b>
<b>第一节 绪论</b> .....	<b>(273)</b>
<b>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b> .....	<b>(277)</b>
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事业及其文化使命	
.....	<b>(277)</b>
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高潮 .....	<b>(288)</b>

<b>第三节 俄罗斯翻译文学</b> .....	<b>(300)</b>
一、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 .....	(300)
二、文化互惠:俄国文学名家与翻译 .....	(303)
<b>第四节 日本明治时代翻译文化</b> .....	<b>(318)</b>
一、明治时代翻译文化概观 .....	(318)
二、明治文学史上的翻译文学 .....	(328)
三、汉字译名——汲取西方文化的媒介 .....	(340)
<b>第五节 翻译在文学史上的意义</b> .....	<b>(353)</b>
一、翻译家与民族文学的兴起 .....	(353)
二、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中的功用	
——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苏格兰为例	
.....	(362)
<b>参考书目</b> .....	<b>(367)</b>
<b>后 记</b> .....	<b>(371)</b>

# 第一章 总论：翻译文化史及其研究

## 一、何谓翻译文化史

我们有翻译史，有文化史，翻译文化史研究什么？

先简述翻译和文化及其历史。

翻译之事，由来已久，古籍中早有记载。《礼记·王制》篇中说，中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北方曰译”。以后，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上“翻”字，遂有“翻译”一词，沿用至今。季羨林、许国璋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写的“翻译”词条中说，翻译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上书，第69页）。再“现代”一点说，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中蕴涵的内容或信息换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这是一般的、广泛接受的定义。（有的意见对翻译要求更高，认为翻译应兼顾原文的形、意两方面）。翻译史则是关于这种语言转换活动的历史。目前关于翻译史的专著很少，仅见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同上，1989），另有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社,1992)。贺麟先生 1925 年已拟撰《翻译西籍小史》(分五章,其名篇“严复的翻译”是第四章中的一节),可后来似未成书。日本是翻译大国,但其翻译史研究也不发达,仅见一本 30 多年前吉武好孝著《明治·大正翻译史》(1959)。欧美翻译史、世界翻译史方面的著作罕见,可见到的有 L. G. Kelly 的 *The True Interpreter* 和我国谭载喜编著《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2)。

文化,在古汉语词汇中是“文治教化”之意。引进西学后,“文化”接受了新的近代含义。关于文化的界说甚多,40 多年前就有 A. L. Kroeber 和 C. Kluchhohn 在所著 *Culture* (1952) 中收集到 164 种文化定义,如今这些定义的数目超过 200 种。但无论怎样定义,文化是理性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价值总和,具有时间、空间意义,这个最根本的特性应是趋同的认识。文化史则以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过程,以人类创造文化又为文化产物所塑造这样一种关系,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为研究对象。因此,文化史有民族、国别的,如印度文化史;有地域的,如阿拉伯文化史;有断代的,如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史;有专门的,如基督教文化史等等。

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的特性,因此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这种沟通离不开翻译,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可见,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翻译文化史主要就是从历史发展上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它不同于一般文化史,这是很显然的。它研究的是,经过了翻译这样的沟通工作之后文化发生的变化。它也不同于翻译史,因为它的重点不是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翻译流派等等。翻译文化史重在研究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



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翻译文化史研究实质上是翻译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结合,通过对历史上翻译活动的考察,研究不同文化接触中的种种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语言、文学的变化,并探究它们在思想文化发展上的意义。

## 二、翻译文化史研究的意义

翻译研究一般分三个方面,即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历史的研究。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现代翻译理论常常试图借鉴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接受美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成果解释种种翻译现象,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翻译技巧研究则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便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如《中国翻译简史》就是按时间顺序记述种种翻译事件。王佐良先生在“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也把翻译研究分为三大类:理论探讨、译文品评、译史研究,与上述相似。但是他对译史研究的期待超出现行的译史工作。他提出,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这是对翻译史研究的更高要求,勿宁说,这正是对翻译文化史研究的要求。《中国翻译简史》是一本好书,是补白之作,但是,史料多而议论较少。翻译文化史研究不能止于这个阶段。

前人在翻译文化史方面已经做过一些开创性工作,例如佛

经翻译对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影响。梁启超曾撰写过“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等文章,强调翻译对于一国文化关系之重大。他认为,由于佛典的翻译,引起了(1)国语实质之扩大(创立新词、引入新概念达 35000 多条);(2)语法、文体之变化(归纳出不用“之乎也者矣焉哉”、倒装句法极多等 10 条);(3)文学情趣之发展(认为近代纯文学如小说、歌曲都与佛典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有两章谈到佛教的翻译文学,他着重论述译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即:(1)造成文学新体—白话文体;(2)产生富于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文学;(3)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除此之外,佛教思想随译经而移植进来,更直接的影响当然还是在哲学上,佛教思想以及此后儒、道、佛之间的斗争与调和,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必书的一笔。

翻译导入的西学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动荡与变革的时代,显然更利于外来文化的引进、吸收,并促使本土文化发生变化。面对外来文化,进步知识分子是如何选择并通过翻译加以摄取的?这种摄取产生了何种结果?

最典型的例子是严复译述《天演论》。

若单以翻译评论的眼光去看《天演论》,我们不会有多少收获。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三字经,而他的《天演论》却与此标准不符。我们只能从翻译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探讨《天演论》的翻译。

严复首先选择翻译《天演论》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处于危亡时刻和他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严复集》,514 页),他说的“格致新理”就是科学的进化论学说。赫胥黎的原作《进化与伦理》既使他看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情进化规律而为之震撼,又让他看

到“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希望而为之激奋。它切合正处险境的中国现实,切合严复的忧患意识,切合他以此作为新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并解释中国社会的心态。因此他选择《天演论》,一是要以西方进化论原理从根本上探讨国家富强之因,二是强调物竞天择的普遍规律,指出中国已在世界竞争中落伍,只有除旧布新,提高民智民德民力,才可能与外强争胜负,三是以引入进化论和提高“三民”为救亡之术,最终为了国强民富之本。简言之,他的《天演论》是普遍进化性的,富有解释力的,哲学形态化的进化论。引进它本身不是目的,引进它以达到保种自强才是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严复构拟了一个特别的翻译方案:他要将西方进化论按照他的导向引入中国。他一半通过翻译,一半通过按语,将他认为必需的达尔文基本原理、斯宾塞普遍进化观和赫胥黎以人持天、自强保种这些新观点一一摄取,连同他自己的理解、倾向和强调,综而统之,注入书中。这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所能解决的。

只有分析和理解了严复译介《天演论》的动机,我们才能解释他如何“做”《天演论》。他的“做”,一是体现在“外部包装”,即译本的语言,一是体现在“内部要素”,即内容的安排调整。这两者都是他对进化论做特殊摄取的产物,也规定了这一摄取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这是译者出于认识和需要的考虑,对所译做了选择性摄取;从深处里看,这里实际显示出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

关于《天演论》的语言,请参看拙文论述(王克非,1992,1994)。严复在《天演论》中附加按语28条,字数多达21000,占全书近2/5,几乎可说《天演论》是严复同赫胥黎“合著”。不仅如此,严复还对原文时有加译、减译和改译,均按他的意图取舍,连书名也不例外(详见王克非,1994),无论从翻译理论还是翻译

技巧去分析,这都不足为法。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译本,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几乎都受到了它的启蒙与冲击。这样的翻译事件只能置于翻译文化史的研究领域,才能对其原因、意义获得比较充分的理解。

### 三、翻译文化史的特点

现代翻译理论教育我们如何忠实原作,准确理解,顺畅表达,遗憾的是,在翻译史上,不忠实或不够忠实的译作屡见不鲜,中外皆然。现代翻译理论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无疑是正确的,自古以来的翻译主张也基本上是求信求达的。我们当然要明白翻译的性质,严肃翻译态度,排斥滥译劣译。但是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仅仅看它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是翻译文化史研究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

从翻译文化史角度看,译本的忠实程度与该译本在文化沟通上的作用之大小并无绝对的正比例关系。译者(其后有文化背景)的摄取是重要因素。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微妙变化,如信息的增损、变样,可以说正是翻译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钱钟书先生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渡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林纾的翻译》,见罗新璋编,1984:

697)钱钟书先生以他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理解,以他对译者劳动成果的宽容,阐明了何以外来文化均有变形。他进而又说:“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译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在各国翻译史里,尤其在早期,都找不到可和林纾作伴的人。”(同上书,705页)有时,从不准确的译本,或再造性质的译述中,可以发现一些具有文化史意义的东西,如译者的不准确是出于水平低,还是有意为之?译者的翻译与自己的写作之间有何关联?再造的译述中表现出哪些取舍抉择?再造的译述中有哪些文化信息的变形,影响又如何?等等。

日本近代翻译史上也有许多不忠实的翻译。尤其是明治时代的前期,翻译大多是自由度很大的意译,而且明确标上“纂译”、“抄译”、“译述”等。明治的翻译是重量而不太重质的,是拿来主义式的大量引入。不少西方古典文学作品、纯文学作品,经过日译后,成了“通俗文学”一类的东西(如普希金《上尉的女儿》被译为《“露国奇闻”·花心蝶思录》;《战争与和平》被译述成《“泣花怨柳”·北欧血战余尘》;还有《三笑人》、《春江奇缘》等)。这种翻译现象与当时日本社会的需要是相吻合的,它首先要求的不是准确的译文,而是急切地需要了解原书原故事中反映出来的西洋社会、思想、观念、风气等等。这对于日本全面西化,实质上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新,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这也是与日本当时“上下一心,求知于世界”的国策相吻合的。将翻译置于文化的背景上考虑,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包括关于翻译的论述,带有功利的色彩,受到时代亦即当时民族文化的制约。翻译事业的发达与否,也与翻译的目的、社会的反响,即文化上是否有此需要,关系极大。例如50年代,中国全面

学习苏联,则俄译昌盛;六七十年代因政治环境,翻译处于低谷;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全面开放,翻译重新起到对于文化和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促进作用。

#### 四、翻译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前面关于翻译文化史的界说已确定了研究的范围。翻译文化史应视为文化史的一个部分。文化史不同于以往重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它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民族和时代的风俗、习惯、精神或价值观,都纳入自己的视野,而一个民族的各时代的优秀人物的文、史、哲杰作往往代表或反映这个民族的文化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沟通了两个以及多个民族的文化。翻译文化史或翻译文化学则考察两种(或多种)文化如何发生交流,这种交流产生的因素、过程、结果和影响。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翻译文化史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

我们大致将翻译文化史研究分三类,一是中国翻译文化史(包括断代的),一是世界翻译文化史(包括地域、国别的),一是比较翻译文化史(主要是将中国的与相关国家的比较)。前两类是纵向的,后一类是横向的。纵向的研究以主要的翻译活动划分时期,如中国翻译文化史可分为:古代——汉唐佛经翻译,中近代——明清科技翻译,近代——西学翻译(包括由日本转译),现代——全方位外籍翻译等四个时期。横向研究包括对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等在不同时期翻译和摄取外域文化中表现的不同或不相同的心态、结果、作用等等进行比较。

例如最让我们发生研究兴趣的中日近代翻译文化比较。

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同样面临外部强权势力的逼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由于文化传统、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等的差异,中日两国对西方思想的翻译摄取也不相同。概言之,日本以“求知于世界”的心态,借翻译大量引进西方思想文化,以变革民心,译书内容无所不有。中国“以将亡而始兴学”,即由于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而逐渐正视西方文化,在选择西书上是审慎的。譬如,在摄取西方进化论学说时,中日都注重进化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但日本的加藤弘之引入进化论的初衷是借以反对天赋人权思想,强调优胜劣败;中国的严复则着眼于自强保种。对于西方自由思想,日本的翻译引进者中村正直注重个性自由、旨在人的品行培养;中国的翻译引进者严复注重社会与个人的自由的界限,虽然也是旨在提高民智民德。在翻译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其他方面,如经济思想、文学作品,两国也有差别。最明显的一点是中国相对于日本的翻译引进滞后 30 年。日本近代明治维新以来,翻译西书达到高潮,仅文学译作就数以千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期 40 几年中,日本翻译中国书籍却落到了最低谷,仅 36 种,比此前 200 年间译 109 种、此后 60 多年间译 3190 余种都少。其中所译汉语哲学书仅 3 本,史学书 7 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等方面一本中国书也没有翻译,这无疑时代环境影响的。这一翻译活动中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正是翻译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参看王克非,1993)。

陈寅恪先生认为,研究一种学说,必须了解这种学说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附审查报告一)。同理,一种新思想的输入和摄取也与所处环境和所受背景相关,后者决定了翻译摄取的轻重缓急,这是我们在研究翻译文化现象时必须考虑的要素。

## 五、翻译文化史的研究课题

相对于过去的翻译研究,翻译文化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扩大的研究视角,因而研究课题或需要重新审视的课题很多,这里略举几个方面。

1. 对重要的文、史、哲著作的中外不同译本(或不同的中文译本)的翻译处理进行研究,对其不同传播和不同影响加以考察;

2. 对译者的翻译过程(如译前的动机、准备,译稿的修改,译作的原始材料等)加以考察;

3. 对翻译的语言(包括词汇尤其是译词、句法、语体)加以研究,并考察它对于本族语言发生的影响。

4. 以上三方面是从微观立场上看。若从宏观的立场,我们更可以考察翻译文学对于某国、某个时期的文学的激发或推动作用,评价翻译家的文化使者角色,估量通过翻译介绍的新思想新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意义。

本书从以往国内外关涉翻译文化史论题的著述中择取富有学术意义的论述,分中国古代部分、中国近代部分和外国部分,为读者展示翻译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成果。凡引用他人的论述,均在该节或该部分之末注明作者及原书名或原篇名,书末列明这些书目的出处,以供读者查考。凡未注明出处的章节均为本书作者所写。

### 参 考 书 目

Steiner, George. 1975.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Lon-



don: OUP.

- 吉武好孝,1959,《明治·大正翻译史》。东京:研究社出版株式会社。
- 陈福康,1992,《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陈玉刚,1989,《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冯天瑜等,1991,《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胡适,1928/1986,《白话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
- 梁启超,1932/1990,《饮冰室合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
- 罗新璋(编),1984,《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祖毅,1984,《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王佐良,1989,《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王克非,1992,论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中国翻译》第3期。
- ,1993,日本明治时代翻译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 ,1994,中日引入进化论之比较。《日本学研究》(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第4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